**田国强：我与《经济研究》**

2018-10-23 09:55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本文摘自纪念《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文集——我与《经济研究》（选辑-与改革开放同行——田国强 ）**



1978年1月《经济研究》的复刊，是中国经济研究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而同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的工作重心，又为经济研究及其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于1979年以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数学师资班学生的身份报考了林少宫教授的数量经济学研究生，成为他的首个入门弟子。这也开启了我的经济学学术之路。一路走来，我从《经济研究》的读者到作者，从审稿人到编委，关系越走越近，我也深为自己能参与到这个中国经济学人普遍公认的顶尖期刊、共同守望的学术园地的建设发展中去而感到高兴。

可以说，《经济研究》是与改革开放同行的。过去40年来，每每在改革开放的关键当口，尤其是思想交锋比较激烈的时候，《经济研究》都会在旗帜鲜明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充分鼓励学术与思想争鸣。我想，这也正是《经济研究》的初心所在。1955年第1期的“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话：“本刊欢迎自由讨论，欢迎以学术态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1978年复刊号征稿启事中也明确刊物拟刊发文章的分类，其中有一条就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对有争论的问题展开讨论。”

回顾过去20多年来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15篇论文，都是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的，也反映了我一直以来对现代经济学及其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关系高度一致的基本看法。

**1.市场经济改革及其制度平稳转型**

中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是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的。这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计划与市场之争的一锤定音的结果，也正是那年我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跟易纲一道开始主持编撰国内首套通俗介绍现代市场经济学的普及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该丛书于1993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其中包括我和张帆撰写的《大众市场经济学》。

如果说这套丛书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1994、1995、1996年，我连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则主要是向专业学者阐述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及其如何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逐步落地的探讨。三篇论文分别是《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中国经济改革的三阶段论》《中国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改革》《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给出了一个在转型过程中“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即有限经济自由、不完善市场环境下的企业产权理论。在该理论框架下，企业所有制及最优产权安排的选择将依赖于经济环境的非规范化程度。根据经济环境的不规范程度的差异，给出不同的最优产权制度安排（民营、集体或国有产权安排）。它表明，只有经济制度环境得到适当改变，才能有效地变换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并论证了通过不断改善经济制度基本环境的改革，中国经济制度平稳转型的三阶段论(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化)的合理性。

**2.开放视野下的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

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充实率低、营利能力差、公司治理结构落后及金融风险大等问题变得愈加突出。如何深化银行业的改革开放以兴利除弊，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我跟王一江教授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对国有银行进行内部改造、实行商业化经营、股份制改革的大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改革的具体内涵和公司治理的具体形式。要意识到实行股份化、上市来引入竞争只是一个经济体制有效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还需要明晰产权，提高外部监督的力度，真正地按市场的要求改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外部制度环境，才能保证提高银行的效率，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包括民营投资者，特别是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治理制度。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银行业对治理模式的选择，我们在2004年第11期《经济研究》发表《不良资产处理、股份制改造与外资战略：中日韩银行业经验比较》一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银行业经验比较，讨论了政府控制下的银行股份制的弊病及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我们指出，韩国金融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所面临的问题，如银行不良债务问题、投融资能力问题等都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但开始采用英美银行模式后，大大激活了金融系统的投融资能力。

**3.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2004年，我开始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体制内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学者和学人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和掌握往往把握不准，甚至不时看到有人从研究方法到结论对现代经济学大肆进行批判，否认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对研究市场经济的现实作用，并宣称要创造出自己的经济学。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往往只给出了观点，既没有明确的前提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也没有逻辑推理和严格证明；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将所谓“自己创新的观点”的作用无限放大。不少人还以为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只能用来研究规范市场制度安排下的经济问题，从而对现代经济学以及它的分析框架和适应范围持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能用现代经济学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经济及其转型问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大众以及学生。

为此，2004年11月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中做了题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的报告。报告在广大师生中取得了热烈的反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后来《经济研究》编辑部王诚教授主动跟我约稿，希望发表这个文章。于是，我对报告稿做了修订完善，在此过程中也广泛听取了艾春荣、白重恩、陈志武、费建平、甘犁、李利明、柳永明、茅于轼、钱颖一、谭国富、王一江、文贯中等人的宝贵批评意见和建议，使得文章的内容和表达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篇论文发表于2005年2月，后来也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学子尤其是博士生的必读经典文献。

2015年，在《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之际，我也受邀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的文章。延续上一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如何看待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数学性的问题，及经济理论之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什么；二是原创性的基础理论、工具方法研究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也就是如何看待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严谨的经济理论都给出了前提条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效，除非理论有逻辑矛盾，否则他们之间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哪个理论或模型更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制度环境的问题。

**4.和谐社会与现代市场体系的一致性**

2004年前后，一些学者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对改革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过犹不及，反思过头了就不是好事，这令人担心。有人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将问题意识形态化，以至于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思潮。他们认为，中国的产权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错误是造成贫富巨大差距和国有大量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停下来。

我认为，这些反对改革的观点严重误导了广大民众，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进行。这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看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及危害性。中国社会有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与现在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有关，与农村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以及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和现代市场体制的不完善有关，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充分良性发展。

在发表于2007年第3期《经济研究》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效率、公平与法治》中，我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特征的和谐社会是内在一致的，是相容的。因而，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办法不是回到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和政府管制经济，而应是加速市场化改革和建立与完善民主法治政治制度，实行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以及《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对《经济研究》提几点期待。

**一是希望鼓励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光有思想没有学术，在中国的传统国学里有很多。这方面我有很多思考，把中国的传统国学与经济学里的很多思想一一对应起来，可以找到相似点，但是这些都是一些经验式的总结，不知道适用边界和范围在哪里，没有边界就很难做到善用，泛用就会产生很大问题。有时误用甚至会对社会、国家造成很大危机，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要立有学术的思想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很可能导致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法为国家社会服务，所以必须要把学术转化为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能听得懂的知识和语言，包括具体的实际应用。并且，近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经济学及其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有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时代性、现实性及思想性。

**二是希望鼓励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理论探索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需要务真求实。过度注重意识形态，就容易造成脱离实际的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脱离教条主义，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取得巨大成就的。因而要尽量避免上纲上线，避免动辄上升为意识形态、阴谋论、敌对势力的大字报式的“文革”性语言，这样将造成很大的社会不和谐，导致极其严重的负面后果。 《经济研究》在这方面要发挥引领作用，不为此类非学术研究提供发声平台。

**三是希望进一步扩大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经济研究》无疑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期刊，但是客观而言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还比较有限。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天然优势，但是中国的学术杂志能否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国际学术影响力，还要进一步探索良策。